

张维华

明清之際中西關係簡史

齊魯書社

# 明清之际中西关系简史

张维华著

齐 鲁 书 社

一九八七年·济南

# 明清之际中西关系简史

张维华著

齐鲁书社出版发行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

850×1168毫米32开本

1987年2月第1版 1987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

书号 11206·135 定价 1.95元

## 出版新序

这部稿子的写成，已是四十余年前的事了。就是在四十余年之前，也不是一个时候写成的。说来话长，乘今日出版之时，有谈一谈的必要。

远在我上大学的时候，学过一门课程——远东史。讲课人是美国的一位老教授，用的课本，是美国人写的。这本书论及南洋群岛的历史，尤其是欧人在南洋发展的情形以及怎样使南洋群岛先后沦为殖民地的，很是详细。我学了这门课程，很有感触，也想在这方面下点功夫，作些研究。一九三二年，我到那时的燕京大学读研究院，读书环境很好，接触了一些有名的学者，我向他们说明了我的志愿，他们都很鼓励我。我在燕京大学读了两年的书，写成了当作我的毕业论文的《明史佛郎机、吕宋、荷兰、意大利四传注释》这本书，当时就在哈佛燕京学社出版了。前几年，这本书又在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改名曰《明史欧洲四国传注释》。我在燕京大学毕业之后，因到济南前齐鲁大学任教，开了一门中西交通史的课，专讲明清之际中国和欧洲的关系这一段。我在燕京大学毕业论文的基础上，写出了专论明清之际中西关系的讲义，教了半年。一九三六年，我离开齐鲁大学，到北京顾颉刚先生所办的禹贡学会工作，事情很忙，安不下心来读书。第二年，爆发了芦沟桥事件，

自此而后进入了抗日战争时期。我只身南下，先后到了开封河南大学，由此辗转到了鸡公山、汉口、重庆、昆明等地，流徙无常，无暇读书和作学问。一九三九年，我到了当时已迁到成都的齐鲁大学任教，一连五年之久，才算安下身读了点书。那时还是想把我所研究的中西关系史继续研究下去。虽然环境不太好，图书资料很缺乏，工作难于进行。但在五年期间，我还是写出了两部稿子：一是《早期中俄关系》，以英人所著的一本书为底子，加上了一些我所能找到的材料。这部分稿子没有完全写完，大体轮廓是勾画出来了，现在还保存着，只是很久没有动它，如果我的健康条件允许的话，想再搜集些资料，整理一番。再就是我的这部《明清之际中西关系简史》的稿子。我把它扩大了范围，将那时的宗教关系和中西文化交流关系一并写了进去。这样作很有困难，但在体系上比较完整些，使人读了容易了解这一段中西关系的全部面貌。这部稿子写完之后，交给了当时的国立编译馆。一九四四年，我离开了成都齐鲁大学，到了先在四川江津白沙、以后迁到重庆九龙坡的国立女子师范学院任教。在那里又开了中西交通史这门课。我用压在编译馆那份稿子，石印了五六十部，发给学生作参考。这个石印本，早已散失殆尽，我手头仅留了一本。这是我过去编写这部稿子的大概经过。我这份石印稿本，有的同志看了，劝我出版问世。当时我很迟疑，现在我决意要出版公之于世，请教大家。自然，这是部旧稿，需要加以修订才能拿出去。因为时代推移，有些论述和言论，纵或适合于那个时候，今天就未必合适，非修订不可。我虽然年老多病，动作不便，也费了几个月的时间，以我所认识到的，尽力所能及，翻阅修订了一遍。

这部稿子，原来是分三部分写的：一是谈交通，二是谈宗教，三是谈文化，即当时所说的西学。我是这样想的，西方殖民势力东来，带进了宗教，即天主教；天主教的教士，尤其是耶稣会士，又传播了各方面的所谓西学，即科学技术之类。这三方面仿佛是各自独立的，然而相互联系为一体的。谈西方传来的文化，不能不说一说天主教耶稣会士。谈天主教耶稣会士，不能不联系到西方殖民势力的东来。我这部稿子分三部分来写，就是这个意思。原先是这样想的，今天看来觉得还可以，所以保存了旧稿这种写法。每一部分之前，加写了一段引言，说明我的一些看法。这是我自己的一些新看法，所以加了进去。有几章，尤其是论西方文化的那几章，旧稿写的有缺漏，不完备，我找了些资料，补了进去。前编中，加写了清前期中西关系概要这一章，是我的学生晁中辰帮我补写的。再是旧稿中有些词句今天看来明显不妥当的，尽量作了一点删改，当然还不能尽如人意。序言方面保存原来的序，又加了一篇《出版新序》，说明这部稿子编写和修订的经过，以及我的一些看法。这就是我修订的大概经过。这样大的一个范围和这样复杂的一段历史，要写得完备无缺，是不容易作到的。其中遗漏错误之处，必然很多，深望读者指正。

这部稿子迟迟不敢出版，固然由于写得不好，不够理想，还因为稿子的内容牵联的问题很复杂，牵联到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势力进行侵略的问题，牵联到宗教上的一些问题。宗教是指的天主教或基督教而言。天主教与基督教都是伴随西方殖民主义而来。帝国主义国家与中国订立的不平等条约上都明文写着宣传宗教的特权，使宗教带上了浓重的帝国主义色彩。这样就需要用正确的政治观点、宗教观点和文化观点作出认真

的分析。要写得使读者满意，而不遭非难，是不容易做到的。但史学工作者有自己的责任，对历史上任何一段有意义的历史，有责任把它写出来。历史是连续的，前浪接后浪，虽然对于现在历史的关系有深有浅，有远有近，但总是互相牵连着，割断了不行。这些前后相衔接的各个阶段，都有它自己的时代性。不能用古人的事和言语论断今天，也不能用今天的事和言论比类古人。因为都各自有他的时代性。再是人类社会所发生的事情，都是辩证地存在着，相互依赖地存在着。只看一方面不行，要看到它的全面。如果以某种事物肯定这一面，否定另一面，那是不正确的。我这部稿子，就是本着这种看法写的。

我是学习历史的。在我学习历史的过程中，认识到这一点：人类文化的交流，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要过程，也是各个国家各个民族从分裂走向和睦团结，和平共处的一个必要途径。我写这部稿子，特别注意中西文化交流的关系，其原因就在此。从中国自身的历史看，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不仅今天是如此，历史上也是如此。但经过几千年的时间，各个民族的文化无日不起着相互融合的作用。自然，文化高的民族所起的作用大一些，文化低的民族起的作用小些，但没有不发生作用的。到今天，兄弟民族之间的文化有了很大的变化，彼此间的隔阂消除了很多，已经成了亲密无间的民族大家庭了。我觉得人类的社会，现在虽然四分五裂，从未来的远景看，也会同中国一样，走向和平共处的道路。胡耀邦同志在十二大的报告中说：“我们是国际主义者，深深懂得中国民族利益的充分实现不能离开全人类的总体利益。”我觉得“人类总体利益”实现的那一天，就是人类文化融合，亲密无间的那种局面。我重视中外文化关系上的交流，其原因即在此。

接着我再谈一谈我们处在今天如何学习或研究历史这个问题。近几年，报刊上常提出如何研究历史这个问题。大都说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来研究，这是十分正确、应该充分肯定的。但是用马列主义来研究历史是通过具体工作和实践来体现的，空谈一些抽象原则，无济于事。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今天，研究历史应该采取马列主义的科学方法。“四人帮”的影射史学固然不足为训，对传统的历史研究方法也应该采取批判的态度。两汉治经的努力，十分可贵，精神可取，但其视线和治学范围，则不可能承继。清乾嘉学派治学的求实精神，十分可贵，但也是其精神可取，其治学方法中之烦琐考据，不能承继。不能象他们那样脱离实际，无分轻重，细大不捐地研究学问。研究学问要适当选择题目，要想一想何者当研究，何者没有必要去研究。时间是有限的，不能浪费时间。今天治史，当以世界眼光，扩大视线，从大处着想，不能把精力费在没有意义的问题上。这是我在整理这部旧稿时，所有的一点感想。

还要声明，这是一部四十多年前的旧稿，原来是用文言文写的，今天已不合时宜，想改写，则没有那份精力，不得已原有文字仍保留了文言。增补的文字，原想也用文言，求得前后一致，但用文言文写，又觉背离时代，不甚适宜，所以就写的接近语体了。因此，这部稿子文体不尽一致，望读者见谅。

一九八三年一月



## 原 序

吾国与欧西之交通，导源甚早。时人记载，多以为早在希腊罗马之时即有往来，然以事迹不甚显著，其详不可尽考。吾国前人记载，以见于《史记》者为最详尽，其先则甚微茫。《史记·大宛传》称武帝时，汉使至安息，使还，安息亦遣使俱来，献大鸟卵及黎轩善眩人。黎轩《汉书》易为黎靬，《后汉书》又易为大秦，名称虽异，所指则一。大秦之地，晚近学人颇多研究，虽其结论未能一致，然其地当不出罗马帝国之东境，即今埃及、叙利亚、巴勒斯坦、美索不达米亚各地。果如其说，则自武帝之时，已有罗马境内眩人初履中国之境矣。自此而后代未有绝。《后汉书·西域传》称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未至其地而还。《西南夷传》称安帝永宁元年，掸国王雍由调遣使诣阙朝贺，献大秦幻人。《西域传》大秦国又称，至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此皆东汉一代，吾国与欧西交通可言者。《南史·夷貊传》称，孙权黄武五年，有大秦贾人，字秦论，来到交趾，太守吴邈遣送诣权，权问论方土风俗，论具以对。《晋书·大秦传》称，武帝太康中，其王遣使贡献。《隋书·裴矩传》记通西域之道，谓：北道从伊吾经蒲类海、铁勒部、突厥可汗庭，渡北流河，至拂菻国达于西海。《旧唐书·拂菻国传》称：贞观十七

年，拂菻王波多力遣使献赤玻璃、绿金精等物，太宗降玺书答慰，赐以绫绮焉。隋唐之拂菻，即以前之大秦，亦指罗马东部之疆域而言。是自东汉末叶，以迄唐初，中欧交通，亦未尝中绝。且贞观初年，景教东来，西方教义盛传中国，所关于中欧间之交通者，尤可称述。自唐而后，降及于宋，使节往还，亦多可述。《宋史·拂菻国传》云：元丰四年十月，其王灭力伊灵改撒，始遣大首领你厮都令斯孟判来献鞍马、刀剑、真珠。说者谓灭力伊灵改撒，即东罗马皇帝，其言或可据也。迨至蒙古兴起，军威远播，达于西欧，欧亚之间，驿邮传递，军旅往来，交通为之大振。欧西之商贾、教士皆得东来吾国，通贸易，传宗教，且或履迹仕宦，通显一时。举其著者而言之，马可孛罗即其一也。大抵自元而前，中欧交通，多取道于陆，跋涉山川，旷渡沙漠，兼以盗贼暴民劫掠之险，旅途往来，至为艰苦，是以此期之交通，时绝时复，未有常则，而于中西文化之沟通，虽不无遗迹可寻，然实未能与近代比。十五世纪末，西葡二国竞为新航路之发现，航运之利，一时称便，而中欧交通之新局，亦自此开始。西人之航至吾国者，始自葡萄牙国，时在明正德年间。厥后西班牙、荷兰二国，相继东来。西洋教士亦接踵至。洎乎明之末季，欧西人士，殆遍于海内矣。清初顺康两朝，优容西士，汤若望、南怀仁辈，均得供职内廷，备受褒崇，西洋教士之宣教中土，遂得固其基础。至于东南沿海之区，则因海运大开，西洋各国，咸扬帆东来，通朝聘，求互市，立商馆，一时海上贸易为之大盛。西北之地，俄人之雄势亦颯颯南下，假贸易之名，谋侵略之实，终至尼布楚、恰克图等条约，先后成立。是当清之初叶，中欧交通，已入繁盛之时期。至于江宁条约而后，欧西列强，方且以东方民族为鱼肉，抱持

其瓜分之雄心，而积弱腐朽之清朝政府，亦甘任宰割，略无抵御之术。窃尝慨之，吾国晚近文化，几于袭取欧西之风尚而不知所以。而于政治外交之情势，尤备受创痛，不堪缕述。即今思往，则以明清之际中欧两地之交通，为其转移之关键。用是著为此编，先述明季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国与中国之关系，说明近世中欧交通发生之影响，以见当时吸收外来文化之重要史实。尝谓清之初叶，中国对于西洋文化，其所发生之反响有二：一为接受；一为拒绝。其所接受者多在“用”的方面，如铳炮之铸造，天文历法之测算，均其类也。其所拒绝者，多在“思”的方面，如宗教思想之数遭顿挫，希腊哲学之未得充分发展等是。盖中国人对于本位思想极重，数千年来，对于伦理观念、宗教思想已有自己一套理论，且视为高越一切，非外来思想所轻易能撼摇者。至于技艺之学，中国初不重视，如外来之学果优，有补国家实用，自不妨采而用之。此种思想，直至晚清而未变更。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论调，实为中国人一贯之态度。由是而知基督教之传入中国，历时虽久，而始终未能透入中国思想之中心者，其原因即在此。又由是而知中国科学研究之精神，迟迟至最近始得发挥者，亦在传统之思想与精神，未能一时遽变也。余不敏，孤陋无闻，爰将历年研求所得，萃为一集，意在将明清间西方文化在中国流布之情形及中国接受与拒绝之态度，条其概略，亦谈近代史者不可或缺之一段也。尚祈当世通人，有以教之。

# 目 录

## 前 编

引言	( 1 )
第一章 中国与葡萄牙早期之交通	( 4 )
一、葡人新航路之发现	( 4 )
二、葡人初通中国	( 7 )
三、中葡冲突之发生及其影响	( 13 )
四、葡商通市闽浙及朱纨之案	( 23 )
五、葡萄牙之侵居澳门	( 28 )
第二章 中国与西班牙早期之交通	( 34 )
一、西班牙之东来及其对于菲律宾群岛之经营	( 34 )
二、林凤南下吕宋及西班牙之初通中国	( 38 )
三、吕宋役使华人征摩鹿加岛	( 43 )
四、采金案之发生及吕宋之惨杀华人	( 46 )
五、中国与西班牙之贸易关系	( 50 )
第三章 中国与荷兰早期之交通	( 55 )
一、荷兰东来及其与中国初期之交通	( 55 )
二、荷兰与华人初期之通商关系	( 58 )
三、荷人侵据澎湖	( 61 )
四、荷人设防台湾及天启崇祯间之内犯	( 67 )
第四章 清前期中国与西方之交通	( 73 )
一、英国	( 73 )

二、葡萄牙	( 86 )
三、荷兰	( 94 )
四、其他诸国	( 102 )

## 中 编

引言	( 109 )
第一章 基督教在中国之再起	( 113 )
第二章 利玛窦之东来	( 116 )
第三章 利玛窦死后天主教之传布状况	( 125 )
第四章 清初汤若望掌钦天监事与历法之争	( 132 )
第五章 康熙间教仪之争	( 137 )
第六章 康熙以后之反教运动	( 152 )

## 后 编

引言	( 159 )
第一章 西方传入中国之天文、算术与历法	( 166 )
第二章 西方传入中国之地理学	( 197 )
第三章 西方传入中国之物理学与农具、火器之制作	( 222 )
第四章 西方传入中国之艺术	( 238 )
第五章 西方传入中国之哲学与宗教思想	( 257 )
第六章 西方传入中国之医药学、音乐学及语言学	( 272 )
第七章 总结	( 286 )

### 附录

中国文化西渐之介绍者	( 289 )
------------	---------

# 前 编

## 引 言

当十五世纪之末和十六世纪时期，是西欧资本主义处在原始资本积累时期，而中国则正当明之后期，也处在资本主义萌芽阶段。欧洲为了积累资本，当然要发展贸易。要发展贸易，除了欧洲自身而外，则要向海外发展。东方世界则成了重要目标。这时欧洲久已知道东方有个极为富饶的大国——中国，也知道欧洲所需要的香料是出自东方南洋群岛的某些岛屿。这些地方都是发展海外贸易的有利区域。中国盛产丝绸，也以产瓷器著名。他们认为这是发展贸易的有利条件。南洋群岛所产的香料，是欧人生活必需品，原先是通过阿拉伯商人之手贩卖去的。他们直接与东方贸易，可以免去阿拉伯人的中间剥削。这也是发展海外贸易的有利条件。所以，欧洲就以中国和南洋为对象，积极开辟向东方发展的海上通道，发展海外贸易。欧洲向东方发展，进行贸易，是自西班牙和葡萄牙两国开其始。原因是，这两个国家处于欧洲的西南角伊比利亚半岛，西向大西洋，东向地中海。地理环境使他们习惯于海上生活。那时又有了地球是圆形的说法，他们认为自伊比利亚西行，可以到达中国或南洋群岛。西班牙人哥伦布、葡萄牙人达·伽马（Vasco

degama) 等人,就是在这种条件下到东方来的。哥伦布到了美洲中部,他认为到了中国。因为他还不知道有个美洲介于大西洋与太平洋之间,到了麦哲伦时才绕南美洲到了东方菲律宾群岛等地。葡萄牙人绕非洲南端进入了太平洋,先后到达印度及南洋群岛各地,继而就与中国发生了海上交通的关系。

葡萄牙与西班牙到东方来,首先遇到海上贸易的敌手阿拉伯人。那时阿拉伯人掌握了海上贩运香料之权,葡西二国要发展海上贸易,必须从阿拉伯人手中夺过来。此时西欧国家在军事技术上已是高出阿拉伯人,很快地就在东方各地战胜了阿拉伯人,夺取了海上贸易之权。需要注意的是,这时商品贸易,不象资本主义社会时的商品贸易。这时西欧国家在东方所转贩的商品,大多是东方各地的土产,而以南洋群岛的热带产品,即各种香料之类的东西进行转贩。不仅对欧洲是如此,对东方各国,如中国、日本各地,亦是如此。手工业产品是有的,如中国当时的出口品,丝织物和瓷器占主要地位。其他各类产品自然亦有。从西欧传进来的小手工业产品也有,但为数不多。总之,当时海上贸易的性质,是受当时各国社会生产决定的。

至于这样的一种海上贸易之权,最早是西、葡二国与阿拉伯商人的竞争,接着就是西欧国家在东方彼此之间的争夺。最初,葡萄牙在东方的势力最大。它的贸易活动,如印度、苏门答腊、爪哇、摩鹿加岛等地都有它的踪迹。在中国境内和日本,也建立了他们的立足点。其势力可谓盛极一时。西班牙则以菲律宾岛的马尼拉为根据地,向中国及南洋摩鹿加岛等地发展。可以说十五世纪末和十六世纪,葡、西二国掌握了东方海上贸易的霸权。一五八八年(明万历十六年),英、荷二国为了争夺海上的势力,与西班牙无敌舰队在英吉利海峡发生

一次重大战争，西班牙失败，英、荷两国战胜。英、荷二国也向东方发展其殖民势力。荷兰在先，英国在后。荷兰东来之后，很快就与西、葡二国发生了冲突，建立了许多通商的立足点。大体言之，西欧国家争夺海上贸易之权的情形，葡萄牙以在印度之哥阿（Goa）、中国之澳门为中心，西班牙以菲律宾岛之马尼拉为中心，荷兰则以爪哇之巴达维亚（Bactria，今日印度尼西亚之首都雅加达）与中国之台湾为中心，四出掠夺。中国是他们要求通商的主要对象。摩鹿加岛是他们要垄断香料贸易的集中地。彼此间之争夺很是剧烈。再其后到了十七、十八世纪，英、法等国海上霸权兴起，西、葡、荷三国之势稍衰，逐渐进入鸦片战争而后的时代了。

西欧国家到东方来，都以要求与中国通商，在中国建立其通商据点为主要目的，所以都与中国发生了不同的关系。本编就是先要论述这个关系，藉以说明下边所要论述的宗教关系与文化关系之由来。这一编共分以下四章：

第一章“中国与葡萄牙早期之交通”，主要论述葡萄牙人东来之经过及其定居澳门前后之情形，兼论其在闽浙等地通商引起的朱纨之案。

第二章“中国与西班牙早期之交通”，主要论述西班牙侵据菲律宾群岛的历史，及其迫害我国侨民之情形，也论述了西班牙与中国通商以及墨西哥银币之流入中国。

第三章“中国与荷兰早期之交通”，主要论述了荷兰东来之经过及其与葡萄牙、西班牙竞争的情形，更论述了它侵据台湾的经过。

第四章“清前期中国与西方之交通”，主要论述入清而后直到鸦片战争前的中国与西方各国之关系。



# 第一章 中国与葡萄牙早期之交通

## 一、葡人新航路之发现

当古代罗马帝国建国之后，国内安定，平民晏乐，富豪贵族，竞尚奢华，而以东方物品为时尚，风气所被，举国靡然。考其时主要商品，其在陆路者，则以彩缯为主干，其在海路者，则以香料为大宗。彩缯贸易，初时操于安息大夏之手，继则渐为波斯所垄断。至于香料贸易，则大都操于阿拉伯商人之手。迨后彩缯之贸易中衰，而香料之贸易转盛。盖香料之为用，可以保物臭，佐炊膳，较之彩缯徒以供装饰者，尤为通常居民所急需也。

中世纪时，香料贸易更为发展，意大利南部诸城市，如威尼斯（Venice）、热那亚（Genoa）等地，均以通东方贸易而著名于世。罗马之富商大贾，亦恒以所贮香料之多寡而为贫富之区分。公元一四五三年，土耳其人占据君士坦丁堡，地中海东端之地，归其掌握。土耳其人信奉回教，对于欧洲大陆之基督教徒，往往发生冲突。是以欧洲商人，视东方贸易为畏途，多裹足不前，而沿红海以通东方之商路，亦为之中绝。是时适当文艺复兴之际，地圆之说，已为少数航海家所谙识，而马可李罗之《东方闻见录》又极夸东方财富之盛，于是欧人谋通东方之志，益奋然兴起。当时滨海诸国，欲通东方之志最切者，以西班牙与葡萄牙二国为最著。西班牙赖哥伦布之力，航抵美